

新地方志学简编

周谷城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新地方史志学简编

王春瑜 李 明 杨向东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三·成都

封面题字：周谷城

责任编辑：张 力

封面设计：贾 梅

新地方史志学简编

王春瑜 李 明 杨向东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成都市书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千

1986年3月第1版 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11316·42 定价：1.10元

序

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史学的发展，我认为有两件大事，最值得称道：一是批判“四人帮”的御用史学，大力冲刷在史坛横流的“左”牌政治油漆、污泥浊水，使史学车轮重新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行；二是编修社会主义的地方史、地方志的兴起，蓬蓬勃勃，蒸蒸日上。是的，写地方史、修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但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几乎在全国所有的市县都认真展开修志编史的沸腾局面。古人曰：“盛世修志”。编修新地方史志高潮的出现，正是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新中国，在历经沧桑后，开始欣欣向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去年春天，我曾有机会在南方三省六市，对编写地方史志作些调查。这次江南之行，使我获得很大教益。我以为，专业史学工作者，应当与地方上从事史志工作的同志相结合，首先向他们学习丰富的编写地方史志的实践经验，然后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在江苏省如东县逗留期间，我结识了《如东县志》、《如东人民革命史》的主要组织者、执笔人李明、杨向东同志。李明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杨向东同志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有志献身于社会主义地方史志的千秋大业，脚踏实地、孜孜不倦地苦读历史文献，钻研地方史志学的来龙去脉，终于迈进了历史科学的大门，并在史学的七宝楼台上，采下一朵朵

鲜花。《如东县志》的出版、重订再版，《如东人民革命史》的问世，以及他们有关地方史志的多篇论文的发表，便生动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对当前的编史、修志，起一点力所能及的促进作用，我与李明、杨向东同志合写了这本《新地方史志学简编》。大体上说，这是一本试图初步探讨新地方史志学体系，研究近几年编写地方史志的经验，并具体回答究竟如何编写新地方史、地方志的入门书。如果说，这本书还值得一看的话，主要是李明、杨向东同志努力的成果。我所做的工作，是不足道的。当然，象任何一部史学著作一样，我们在写这本书时，曾广泛阅读了史学前辈、史志界同仁的著述，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笔耕，我们的这本书，显然会成为无本之木。这里，谨向他们深表敬意。

周谷城师在百忙中为本书题签，特向周谷老深致谢忱。

新的地方史志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在草创阶段。尽管我们对它的探讨，还属于ABC之列，但仍然深感学力不逮，难免存在错误，至盼海内同行，大力匡正。

王 春 瑜

1985年9月25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序.....	王春瑜
第一章 新地方史志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一节 新地方史志的产生.....	(1)
第二节 新地方史志的发展.....	(3)
第二章 新编地方史志理论研究述要.....	(6)
第一节 对旧史志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	(6)
第二节 新史志理论探索的成果.....	(12)
第三节 新编地方史志的实践.....	(21)
第四节 繁荣史志理论的管见.....	(25)
第三章 编史修志的准备工作.....	(27)
第一节 领导机构及工作班子的组织.....	(27)
第二节 积极唤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	(30)
第三节 编史修志规划的制订.....	(32)
第四章 资料工作.....	(36)
第一节 资料征集.....	(36)
第二节 资料考订.....	(46)
第三节 资料整理.....	(56)
第四节 资料管理.....	(59)
第五章 史志体例与篇目.....	(66)
第一节 史志辨体.....	(66)
第二节 史志拟目.....	(75)
第六章 地方史的编写.....	(82)
第一节 基本要求.....	(82)

DOSS/13

第二节	编写方法	(85)
第七章	地方志的编写	(92)
第一节	“概述”的编写	(92)
第二节	“大事记”的编写	(97)
第三节	“地理编”的编写	(103)
第四节	“经济编”的编写	(108)
第五节	“政治编”的编写	(115)
第六节	“军事编”的编写	(120)
第七节	“文化编”的编写	(123)
第八节	“社会编”的编写	(128)
第九节	“人物编”的编写	(133)
第八章	专业志的编写	(139)
第一节	专业志的种类及其作用	(139)
第二节	专业志的体例和篇目	(141)
第三节	专业志的编写方法	(145)
第九章	乡镇志的编写	(148)
第十章	地方史志的审查、修订和出版	(151)
第一节	审查和修订	(151)
第二节	出版和发行	(153)
第十一章	编史修志工作者的修养	(154)
第一节	史 识	(155)
第二节	史 德	(156)
第三节	文 风	(158)

附 录

一、社会主义新方志大事记	(162)
二、《如东人民革命史》目录	(171)
三、《如东县志》(修订本)目次	(175)
校后记	(184)

第一章 新地方史志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新地方史志的产生

编纂地方史志是中华民族一个优良的历史传统。但是，任何时代编纂的地方史志，都只能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作指导。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后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编纂的地方史志，有的尽管在书名上冠之以“新”的名号，但都是封建时代、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在指导思想上都不可能不打上旧时代统治阶级的烙印。因此，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封建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作为编史修志的指导思想，这是区别新旧地方史志的分水岭。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逐步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新地方史志的产生，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些学者参加地方史志的编纂，便开始在内容上注意体现思想性、人民性和科学性。如王国维（1877—1927）撰修的《浙江通志》、黄炎培（1878—1965）主纂的《川沙县志》、庄为玘撰著的《晋江新志》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摒弃了旧志书中所沿用的穿凿附会的“星野”、夸大失实的“八景”、宣扬封建节烈的“列女”、为封建统治者卖命的“忠义”和荒诞不经的“祥异”等糟粕。

李泰棻在一九三五年总纂的《阳原县志》自序中说：“近半世纪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故作史须重社会关系、民生，尤贵生产样式。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史潮，岂能独外。”尽管该志的编纂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以进化论作指导思想，但志书中还是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与阶级关系，如生产工具、地价、工资以及佃农、自耕农、富农、庄主等情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黎锦熙（1889—1978）在一九三九年所写的《方志今议》，提到“今日而修方志，决非旧志之旨趣与部门所能范围，即章氏特创之义例，横拓之领域，由时代之进展，亦颇感其未尽适宜而殊嫌不足也”。①他所拟订的《城固县志》的篇目以及主纂的《洛川县志》、《同官志》、《宜川县志》等，虽然渗透了一些旧观念，但取材比较精当，内容比较新颖。如有五十多万字篇幅的《洛川县志》所载大事年表、疆域建置、气候、地质、山水、人口、物产、地政、农业、工商、交通、吏治、保甲、社会、财政、军警、司法、党团、卫生、教育、宗教、祠祀、古迹古物、氏族、风俗、方言、谣谚、人物、丛录等，都有一定的科学性。

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地方史志，虽不能完全算是新地方史志，但可以说是新地方史志的胚胎。

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②当时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正是这种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所以，尽管根据地的战事十分频繁，但是它有着特定的土壤，能够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① 黎锦熙《方志今议》第1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

的新地方史志发芽、生长。事实上，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出现过专门记载人和事的新地方史志。如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之一、著名文学家、近代文化史专家阿英（钱杏邨）（1900—1977），当新四军挺进苏北后，即从上海携妻儿奔赴苏北，随新四军军部活动，积极从事文化救亡工作。在盐阜抗日根据地，他十分重视盐阜的方志、里乘，大力搜求，一九四三年，写成四卷《盐阜民族英雄传》，发表在新四军军部出版、由阿英本人主编的杂志《新知识》第五期上。他在序言中写道：“《盐阜民族英雄传》初稿四卷，据《盐城县志》、《续修盐城县志》、《阜宁县志》、《阜宁县新志》、《安东县志》、乾隆《山阳志》摘抄本，并略参其他典籍纂成。客居无书，征借匪易，体系虽具，阙略仍多。……续征未见盐阜区各县志乘……与其他有关盐阜民族英雄史实载记，以作补充修订”。这里所说的“体系虽具”，可以看作是用无产阶级立场，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编写新地方人物志的有益尝试。《盐阜民族英雄传》共写了二十位历史人物，上从南宋陆秀夫起，下迄现代上海纱厂工人领袖顾正洪，都是盐阜区历史上反侵略、反民族压迫的志士仁人，他们的英雄业绩，是可歌可泣的。《盐阜民族英雄传》发表后，对盐阜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很好的教育、鼓舞作用。从新方志的发展史来看，《盐阜民族英雄传》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早在战争年代，我党的老革命家即从事过编修地方史志的实践，用新的地方史志，紧密配合当时的抗日战争。应当说，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新地方史志，正是从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产生的。

第二节 新地方史志的发展

建国以后，创编新地方史志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尤其是我

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编史修志工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迫切需要新地方史志为之服务，新地方史志的编纂已经提到我们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一九五六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划草案中，提出了编写地方志的任务，并且成立了地方志小组。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倡议编修地方志。十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起草了《新修地方志条例（草案）》。至一九六〇年六月，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五百三十多个县开展编史修志工作，其中有二百五十多个县编出了初稿。在此前后，全国各地还编写出一大批厂史、校史、店史、社史、村史以及工运史、农运史、妇运史、青运史等等。可是刚刚兴起的编史修志工作，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如强调以“反资”为中心，以简单化的忆苦思甜，代替客观的历史分析，使一哄而起的大写“四史”运动，一开始便偏离科学性的轨道）以及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特别是受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项工作完全中断了。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编史修志工作才开始复苏。一九七八年，全国各地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展编史修志工作。七月九日，胡耀邦同志在李百玉建议修志的信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①十月，中共湖南省委作出了恢复《湖南省志》编纂工作以适应四化需要的决议。地处边陲的黑龙江省呼玛县也迈开了编史修志的步伐。他们不愧是编史修志战线上的尖兵。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编史修志工作带来了春天。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报告的十六号文件中，发出了在全国各地“编史修志”的号召。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

^① 见河南省周口地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地方志编纂手册》第2页。

本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修新方志的任务。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各地的编史修志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八四年，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一千多个县、市，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比较广泛深入地开展编史修志工作。一部部新编地方史志在陆续问世，有关地方史志理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也在不断涌现。伴随着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新地方史志的编纂及其理论研究，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方兴未艾地向前发展。

第二章 新编地方史志理论研究述要

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史志理论，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一是编纂社会主义的新地方史志的实践。这两条途径缺一不可。

第一节 对旧史志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

唐宋以前史志不分家，“史即志，志即史”。宋朝以后，史志分家，志遂发达，且日盛一日；而地方史却日益衰落下去。到了清朝，编纂地方志进入全盛时期，成书四千三百余部，^①而地方史却成效甚微，寥寥可数。^②地方志与地方史由于在数量上的悬殊，自然对其理论的研究也大相径庭。清代是编纂地方志的黄金时代，也是方志理论成熟的重要时期；而地方史的理论研究几乎无人问津，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因而当前史志学界所论及的“对旧的史志理论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主要是对旧的地方志理论而言的。

①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② 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该文收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不能割断的，有其继承性。作为历史文化组成部分的地方史志也是如此。

随着地方史志工作的普遍开展，“批判与继承”的问题非常急迫地提到广大史志工作者面前。近几年来，史志学界已经写出了一些文章，如刘光禄《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修志主张》^①及《关于批判继承方志学历史遗产的几个问题》、^②黄苇《方志的继承和创新问题》、^③李德运《清代乾、嘉年间编修地方志的三个学派及其理论观点和方法简述》、^④潘新藻《章学诚论方志体例述评》、^⑤仓修良《论章学诚的方志学》、^⑥董一博《论地方志的批判继承与创新》、^⑦傅振伦《方志的继承与革新》^⑧等。这些文章使史志学界的初涉者耳目一新，人们普遍认为：编修社会主义地方史志，既要批判，又要继承，懂得继承，才有创新。

方志学界认为，我国古方志流派虽多，但到了清朝乾嘉时期主要是三派：以戴震（1723—1777）为首的地理派（又称考据派），以章学诚（1738—1801）为首的历史派，还有地方官绅派。

地方官绅派编修志书的数量虽多，但无系统的理论作指导。在这一派中有主张“扬善”和“善恶并书”的区分。主张“扬善”的人，认为志书主要记载地方上的“名人胜事”、“佳景奇迹”，以彰一地“人文之盛”。因此，在他们修的地方志书中，通常糟粕较多。如“天人感应，崇尚迷信”、“皇言圣恩，贵载

① 《档案工作》1981年第2期。

② 《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6期。

③、④ 《安徽地方史志通讯》1983年第4期、第1期。

⑤ 《湖北方志通讯》1982年第4、5合期。

⑥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⑦、⑧ 《中州今古》1983年第5期、第6期。

世族”、“夸称政绩，浮文虚事”、“忠孝节义，维护风教”、“隐恶扬善，奸宄不载”、“抄袭拼凑，彰异猎奇”等等。主张“善恶并书”的人在明清之际虽有一些，但修的志书不多见。对地方官绅派的做法，今方志学界多持否定态度。

考据学派中的修志名家较多，比如毕沅（1730—1797）、戴震（1723—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9）等。这一派主张用正史中的有关材料作为编修地方志的根据、凭借，而把反映现实状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档案材料弃之不用。戴震主张：“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①戴震的论点在当时已被章学诚驳倒。今方志学界亦多持否定态度。当然考据学派严谨求是的良好学风，我们是应当继承和借鉴的。

我国古代的史学遗产颇为丰富，但主要成就体现在汗牛充栋的历史编纂学方面，以历史哲学为核心的史学理论，则显得相当贫乏。作为传统史学一个分支的方志学，在理论方面，同样是薄弱的。清乾隆时期的史家章学诚，对编史修志作过比较系统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因此，当今方志学界对旧的地方志理论的扬弃问题，主要的就是对章学诚所建立的地方志理论的分析、批判与继承的问题。综合史志界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认为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从“志乃史体”的角度出发，确立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清代以前的学者，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在史学上的地位并不重要，也不为史家所重视。直到清代，章学诚才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方志是地方史的重要创见。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就列于“殷鉴”之列，作用大多了；它的任务首先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因此，“志乃史体”的观点，除有提高地方志地位的积极意义外，还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

① 《章氏遗书》卷十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

兼通古今，包罗万象，详近略远，使地方志成为一方之全史；二是可以按外纪、年谱、考、传等体，分清门类，避免内容混乱重复，颠倒错漏，支离破碎；三是在文辞方面可以谨记事实，秉笔直书，讲究文质，摒弃浮文，以增强地方志的真实性、可信性。

“志属信史”之说，为章氏之后修志的有识之士所遵奉，这对提高志书质量有重大影响。且和当今编史修志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志属信史”，必然十分重视资料的基础作用。无论是旧的史志，还是新的史志，资料的有无、多少、正误、真伪、衍缺，是决定地方史志本身质量的关键。章氏强调编史修志要真实地记载一地的情况，以记述一方兴衰变迁的客观史实和兴革利弊的经验教训，这种观点显然闪烁着唯物史观的光芒，对我们今天编史修志是仍具有启迪作用。

当然，由于时代的前进，科学的发展，史志本是“同源异体”，即“史有史体，志有志体”，方志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再用“志即史”的观点来指导今天编修地方志。

第二，提出方志分立三书，创立了完整的修志义例。

方志分立三书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章氏方志理论的成熟——章氏方志学的建立。

章学诚经过长期“屡应志乘之聘”的实践和研究，写出《方志立三书议》，认为欲修好方志，必须分立三书。所谓“三书”，就是一部地方志书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志》、《掌故》和《文征》。《志》由纪、图、表、考、传等组成，是志书的主要部分，也是属于著述的部分。《掌故》是按照州县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汇辑档案史料。《文征》是仿照文选、文苑的体例，分别汇录诗文。章氏认为“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①《志》为主体，《掌故》和《文征》

① 《文史通义》卷六，外篇。

是志书的两翼，是保存资料的汇编。从而，构成一部完整的地方志书。

方志学界不少学者在肯定“分立三书”之举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指出：编修志书是要注意体例的，体例是志书组织材料的形式，但章氏却过于拘泥体例了，并把他的志例主张自诩为“不祧之宗”是不妥当的。然考其实，章氏自己亦未完全照办。考察章氏《作志》一书，包括纪、传、图、表、考、政等项，所谓“纪”者仅二目：一曰《皇言纪》，一曰《皇朝编年纪》（附前代）。此举，即就当时而论，也是全无必要的。地方志是一方文献，而“皇言”、“圣谕”之类，属之一国，不属一方，载之方志，于义何据？至于《掌故》，既为州县六房的档案史料，何不分门类入志？同样《文征》可入《艺文志》中，且只要列其书目，至多附简明提要足矣，何须篇篇原文照存？因此，编修社会主义的新志书，更不可拘泥于章氏“三书”。事实上，中国地方志协会的“建议篇目”就没有受“三书”的束缚，而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了。

第三，章氏所论志书标准，是章氏方志理论的重要内容，值得今人借鉴。

章氏总结的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有“四要”：“简、严、核、雅”；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予杜是否难”；有“八忌”：“条理混杂、详略失体、偏尚文辞、妆点名胜、擅身旧案、浮记功绩、泥古不变、贪载传奇”。^①这些高度概括的经验之谈，都是非常精彩而恰切的，可为今日修志者直接效法。

第四，章氏关于州县设立志科的建议，颇具现实意义。

^① 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修志十议》。